

← (上接 12 版)

之,不累其曹。有改良之论,有进化之方,有验瘟之器,有贮粒之法,有微粒子病肉眼鉴定之法,有微粒子病识验之报,其术极细以精矣。其柔有栽培实验之秘。呜呼!中国于茶、丝二业尚不开局考求,而坐听颀颀者自为战,其不尽输与他人者几何!”

这是康有为在著作中第一次言及“进化”一词。王宝平教授的研究已经证明,《日本书目志》是康有为及其弟子抄录日本刊出的《东京书籍出版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》而成。我有理由相信,该《书目》中的绝大多数著作康根本没有看过。康并不知道《书目》中录有三部非常重要的进化论著作:其一是伊泽修二翻译的《进化原论》(在生物学类下),此即赫胥黎的讲演集 *On the Origin of Species: Or. the Causes of the Phenomena of Organic Nature*; 其二是由东京大学学生石川千代松记录的《动物进化论》(在生物学类下),此即美国生物学家莫尔斯(Edward Sylvester Morse, 1838—1925)在东京大学讲授生物学的内容,是达尔文学说传入日本的标志性事件;其三是由东京大学教授外山正一校阅的《社会学之原理》(在社会学类下),此即斯宾塞的著作 *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*。“进化”说的是物种起源,本是自然的选择,并非人为技术的直接结果。康的评论称:“有改良之论,有进化之方,有验瘟之器,有贮粒之法,有微粒子病肉眼鉴定之法,有微粒子病识验之报”,将“进化”误作为人为技术手段之一。由此可推知,康没有读过《蚕桑进化论》一书,只是望着书名而信口言之。

康有为在比较明确意义上使用“进化”一词,是政变后流亡日本时期。1898年冬,康有为在东京著《我史》,其中“光绪十八年”(1892)一节,称言:“以伪《左传》乃刘歆采《国语》而成,改分国为纪年……《史记》十二国年表,自称采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,乃史迁亲读《国语》原本为之者……又择其伪古文《礼》与《周礼》合者去之,以还《国语》原文之旧,令长女同薇编之。薇时年十五岁,天资颇颖,勤学强记,遂能编书也。薇又将廿四史,编《各国风俗制度考》,以验人群进化之理焉。”

这一段话,是康有为称赞其长女康同薇之聪慧。前半段指康同薇重新整理《国语》,即康学中“新学伪经”的内容;后半段指康同薇著书《各国风俗制度考》。“各国”是春秋各国及后来的各朝代,康有为称该书“验人群进化之理”。康使用“进化”一词,并非受其编《日本书目志》



从1902年到1923年,康有为对“天演”、“竞争”从怀疑而渐至反对。由此查看康一生最重要的著作《大同书》,可以看到奇特的现象,即“进化”与“天演”的背离。

之影响,而是到了日本之后的耳食,很可能得自于梁启超。而康这里所说的“进化”,我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达尔文、赫胥黎、斯宾塞进化思想的痕迹——这位虚龄十五岁的女子,1892年(光绪十八年)坐在书斋之中,使用“二十四史”之类的材料,即可以“格物”而“致知”。若要真是如此,达尔文为时五年的环球考察岂非虚行?严复费时多年的翻译工夫岂非徒劳?康这里只是借了一个名词,恰恰证明康这时对进化论的内容并没有真正掌握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严译《天演论》在中国虽有多次印刷,也有众多读者,但“天演”一词在当时和后来运用得并不多;达尔文学说传入日本后,其采用的译名为“进化”,反是“进化”一词在中国被广泛使用。从“天演”到“进化”,以译名的使用而观之,达尔文学说有从日本再次传入中国的过程。

不能因其主张进步,便称之受西方进化论影响

人类的历史是从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的,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描述了这一事实。中国的古代典籍,包括儒家的经典,对此都有相应的记录。绝大多数人阅读中国典籍,不难得出历史进步的结论,尤其是中国早期历史。这是历史的进步说,与进化论不同。

人类对历史的解说有着各种差别,不在于认定历史是否进步,而在于解释历史进步的原因不同。儒家历史学家将“三代”的辉煌描绘成圣人的功绩、圣道的功用,即如孟子所言:“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,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”(《孟子·离娄》)

康有为在1898年(光绪二十四年,戊戌)出版了《孔子改制考》、《春秋董氏学》两部书,全面阐述其“孔子改制说”,亦初步揭示其“大同三世说”,但没有详细展开。“大同三世说”是主张历史进步的学说,不能因其主张进步,便称之受到源自西方的进化论之影响。

康有为的“大同三世说”,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。按照康的说法,这一学说是由孔子创制,口传其弟子,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,主要是《春秋》及《公羊传》、《礼记》(尤其是《礼运篇》、《中庸篇》和《大学篇》)、《易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论语》等文献,以留待“后圣”之发现;泰西各国的哲人对此学说亦有所体会,有所施行,此即前面提到的梁启超致严复信中所言:康对梁称“此必西人之所已言也”,“西人治此学者,不知几何家、几何年矣”之意。

按照康有为的说法,他从1884年(光绪十年)便发现了“大同三世说”,这一说法很难予以证实。到了戊戌(1898,光绪二十四年)年间,康的“大同三世说”基本思想,应是大体形成。由于康有为曾向梁启超等弟子传授过“大同三世说”的基本内容;从梁启超等人此期的著述中,可以略知其详。

1900年(光绪二十六年)秋,康有为从新加坡移居槟榔

屿。此时,康发动的“庚子勤王”已经失败,对现实政治也陷于绝望,重返思想与学术之园地。1901年冬,为改善居住地的气候,康移居印度大吉岭,至1903年初夏离开。旅居槟榔屿、大吉岭两年多的时间,是康一生中最为从容休闲之时。他遍注群经,写了《礼运》注、《孟子》微、《中庸》注、《春秋》笔削大义微言考、《论语》注、《大学》注和《大同书》。注释是当时儒学者表达自己思想的主要写作方式,康的“大同三世说”亦通过这些著作,从思想观念而落实到了具体的文字。进化论的学说也开始为康有为所运用。

康有为在《礼运》注中9次使用“进化”一词,在《孟子》微中使用了21次,在《中庸》注中使用了11次,《春秋》笔削大义微言考使用了40次,在《论语》注使用了21次。以上的五部著作,“进化”一词共使用了102次。((《大学》注)现仅存序文;《大同书》后有很大的增改,我放在后面叙述)从康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,他在绝大多数语境中将“进化”一词当作“进步”的概念来使用。我在下面举三个例子。

先来看《礼运》注。该书是康有为对《礼记·礼运篇》的注释,是“大同三世说”最重要的著作之一,完成于1902年3月。《礼运篇》最重要的一段,是“大同”,文曰:

“大道之行也,与三代之英,丘未之逮也,而有志焉。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,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,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矜寡、孤独、废疾者,皆有所养。男有分,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。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窃乱贼而不作,故外户而不闭。是谓大同。”

这一段话,正是康“大同三世说”的核心证据,也是核心内容。康在注释时,3次使用“进化”一词:

“大道者何?人理至公,太平世大同之道也。三代之英,升平世小康之道也。孔子生据乱世,而志则常在太平世,必进化至大同,乃孚素志。至不得已,亦为小康……”

“故公世,人人分其仰事俯畜之物产财力,以为公产,以养老、慈幼、恤贫、医疾。惟用壮者,则人人无复有老病、孤贫之忧。俗美种良,进化益上,此父子之公理也。分者,限也。男子虽强,而各有权限,不得逾越。尚者,巍也。女子虽弱,而巍然自立,不得陵抑。各立和约而共守之,此夫妇之公理也……”

“然人之恒言曰:天下国家身,此古昔之小道也。夫有国、有

家、有己,则各有其界而自私之。其害公理而阻进化,甚矣。惟天为生人之本,人人皆天所生而直隶焉。凡秉天之下者皆公之,故不独不得立国界,以至强弱相争。并不得有家界,以至亲爱不广。且不得有身界,以至货力自为。故只有天下为公,一切皆本公理而已……”以上康的引文,为了节省篇幅,我只摘其要,没有引全。引文的第一段与第三段,康使用“进化”一词,指的是“据乱”、“升平”(小康)、“太平”(大同)三世之更替,是由孔子发明的,应与达尔文、赫胥黎的学说无涉;且若将“进化”一词改为“进步”、“变化”、“更替”等词,意思也是相同的。第二段的情况比较复杂,康有为使用了“俗美”、“种良”两个概念(康在后文称“化俗久美,传种改良”)。“公世”与“公产”,似属“俗美”;康也提及“壮者”,以及“强”、“弱”的概念,但没有具体谈到如何达到“种良”。此处的“进化益上”是否属人种学或生物学上的“进化”,从康自己的说法中还是难以确定的。

再来看《孟子》微。该书是康有为对《孟子》一书的注解,也是“大同三世说”的重要著作之一,完成于1901年12月。《孟子·滕文公》中谈到了中国早期的历史发展,称言:

“……故曰:或劳心,或劳力,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。治于人者食人,治人者食于人,天下之通义也。当尧之时,天下犹未平,洪水横流,泛滥于天下,草木畅茂,禽兽繁殖,五谷不登,禽兽逼人,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。尧独忧之,举舜而敷治焉。舜使益掌火,益烈山泽而焚之,禽兽逃匿。禹疏九河,滂济、漯而注诸海,决汝、汉,排淮、泗而注之江,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。当是时也,禹八年于外,三过其门而不入,虽欲耕,得乎?后稷教民稼穡,树艺五谷,五谷熟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,饱食、暖衣、逸居而无教,则近于禽兽。圣人有忧之,使契为司徒,教以人伦:父子有亲,君臣有义,夫妇有别,长幼有序,朋友有信。放勋(尧)曰:劳之来之,匡之直之,辅之翼之,使自得之,又从而振德之。圣人之忧民如此,而暇耕乎?尧以不得舜为己忧,舜以不得禹、皋陶为己忧。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,农夫也。分人以财谓之惠,教人以善谓之忠,为天下得人谓之仁。是故以天下与人易,为天下得人难。孔子曰:大哉尧之为君!惟天为大,惟尧则之,荡荡乎民无能名焉!君哉,舜也!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!尧、舜之治天下,岂无所用其心哉?亦不用于耕耳。”

孟子从“劳力”、“劳心”之别,而引发出的一大篇中国早期历史发展进程的言说,将历史进步